

15-23

1960年代美國學界關於中國學學科問題的討論

On Problems with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n Academics during the 1960s

韋磊 (Wei Lei)、王保勝 (Wang Baosheng) *

前言

經過麥卡錫主義肆虐之後，美國學界的中國學到1960年代開始復甦。¹而在中國學復甦的過程中，美國學界也開始思考並討論中國學的學科問題。在1960年代美國學界關於中國學學科問題的思考和討論中，1964年3月由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於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第16屆年會上發起的討論無疑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這次討論彙集了蕭公權(Kung-chuan Hsiao)、施堅雅、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芮瑪麗(Mary C. Wright)等美國中國研究界的眾多著名學者，同時還邀請了英國著名的中國研究專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討論的內容後經亞洲研究協會主辦的刊物——《亞洲研究雜誌》(*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整理發表。在這次討論中，學者們就中國研究學科的基本問題，以及中國研究的方法等問題，從不同角度均闡述了各自的觀點。

一、中國研究學科的基本問題

關於中國研究學科的基本問題，學者們主要探討了中國研究是否是學科的問題、漢學相關問題，以及防止

學科崇拜等問題。

中國學(或者說中國研究)的一個主要學理淵源是漢學。²因此，1960年代關於中國學學科討論問題中，有學者就是從漢學的角度加以探討。其中，蕭公權從漢學與中國研究的對比，以及漢學向中國研究的轉變予以探討，他認為中國研究更具有「學」的性質。而牟復禮則立足於其對漢學的理解，探討了漢學的完整性問題。史華慈則在學者們探討中國研究成為學科的基礎上，提醒人們中國研究成為學科，但是更要警惕學科崇拜問題。

(一) 中國研究是否是學科的問題

關於中國研究是否是學科的問題，當然是中外學者所關注的。因為，如其根本上不能被作為學科，那麼就無法討論其作為學術研究的存在和發展了。因此，這當然也就成為復興海外中國研究者首先關注的問題。

在大陸學界流行著這樣一個既定的認識，即在西方，漢學被認為是學術的，而中國研究則不被看作是學術研究。(持這樣看法的中國大陸學者有李向前、何培忠等)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在西方，中國研究不是學科，而漢學才能被稱為真正的「學」。但實際上，在海外學界，特別是在美國學界卻有不同的看法。

一般來講，學科在中文是指：1. 學術的分類。指一定科學領域或一門科學的分支。如自然科學中的化學、

* 韋磊，現為北京中國地質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王保勝，現擔任合肥市文博中學校長辦公室主任兼政史地教研組組長。

1 參見侯且岸，《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關於漢學和中國學的概念問題，在中國大陸以及海外學界都沒有統一的一致認可的解釋。我們認為漢學主要是側重於採用傳統的人文學科的方法對於傳統中國的語言、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等等的研究。中國學主要採取的是跨學科的區域研究，特別強調社會科學方法在中國研究中的運用，而漢學往往採取的是單一的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更談不上進行區域研究了。

物理學；社會科學中的法學、社會學等。2.「教學科目」的簡稱，亦即「科目」。³ 在英文中 discipline 這個詞與 science 有著共同的含義，即 a branch of knowledge。也就是說，無論中外，能稱得上學科的必然是有著科學的含義的。那麼「學科」就是有著確定的研究對象，規範的研究方法，強調客觀性的以探尋研究對象發展規律的知識系統。而美國學界在 1960 年代討論漢學和中國學誰更能界定為「學」時，基本上就是按照上述標準來討論的。

蕭公權透過對比漢學和中國學之間的變化和區別而得出結論。其在討論文章中說到：「早期，那些從事漢學的人大多數並非是學者。由於不承擔建立學科的責任，坦率地說在方法上就是業餘的，在更為嚴格的學科導師眼中，他們幾乎使漢學品質低落了。」⁴ 從蕭公權的話語中我們可以解讀出這樣的訊息：1. 早期漢學並沒有嚴格的學術研究規範，特別是沒有嚴格的研究方法作為支撐。2. 早期漢學本身並沒有將自己作為學科來加以要求和發展，因此並不能被當作是嚴格意義上的學科。3. 由於前兩點，就使得漢學在很多嚴格的學者看來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在蕭公權看來，真正能稱得上是學科的是中國學（中國研究），蕭通過說明中國研究在美國發生的轉變，進而說明中國研究向學科化的轉變。這種轉變主要有：學術訓練規範並且開始被強調起來、其他學科的方法開始被引入到中國研究領域。而「這個過程，可以被形容為中國研究的『學科化』，因此也是制度化。」

此外，在討論中還有學者認為，漢學具有情感色彩，而中國研究則更具有客觀性，而且，漢學正在為中國研究所取代。施堅雅認為：「傳統的漢學研究培育了對單一文明無批判的沉浸，現代中國學至少帶來了一定程度暗含了公正的比較方法的使用。而漢學的重點是中國的『偉大傳統』，並力圖抓住他們所研究的文人著作的精神氣質，今天的中國研究，試圖涵蓋整個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產物，研究這一區域伴隨著『偉大傳統』的『小傳統』，並為探索之目的而移情於非精英社會團體與文人。」

漢學學科本身正在被具有特定研究目標、進行跨學科嘗試的中國研究所取代。⁵

也就是說，當中國學開始在美國出現和發展起來後，中國研究才能真正被稱為「學」，而漢學，如前所述是不能被界定為「學」的。蕭公權的說法，中國大陸很多學者可能會不同意或者反對。但是，我們仔細思考蕭的說法，確有合理之處。早期漢學，很多不僅帶著濃厚的偏見看待中國，而且其中很多作品確實很難稱得上是學術著作。因為，早期「漢學家」有不少並不是學者，或是傳教士，或是來中國旅行的西方人。那麼這些人關於中國的記述，大多只能是感性的表面描述，而非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因此，這些作家及其著述，我們認為很難稱其為「學」。當然，我們也不應該完全割捨這些遊記類作品與海外中國研究的關係。他們畢竟在很大程度上介紹了中國，使海外人士對中國有了感性的認識，甚至是激發了他們關注中國、研究中國的興趣。但是其作用和地位可能僅限於此。

不僅如此，一種研究能否成為學科，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也在於它是否能被學界所認可。在蕭公權看來，當中國學逐步步入學科化軌道後，也逐漸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同時，早期海外漢學的一些研究也有很多已經帶有了立足於某一學科研究規範的研究，從學科的角度方面講，這一類研究是能夠被定性為學的。但是問題的焦點在於，不能夠籠統地認定早期海外人士關於中國的所有記述、論述都能定性為「學」，而應該具體區分，凡是採用了嚴格的學術規範，持科學的、客觀的態度對中國進行研究的則應該被歸為「學」一類，相反則不能稱其為「學」。因此，就目前來講，這也正是進行海外漢學研究的一個原因所在。

（二）漢學完整性問題

據筆者所見資料，在美國，關於漢學和中國學概念的界定也是個棘手的問題。不同學者在不同意義上使用

3 《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頁 3194。

4 Kung-chuan Hsiao,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the Twins Shall Mee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No. 1 (Nov., 1964), p. 113.

5 G. William Skinner, "What the Study of China Can Do for Social Scienc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 4 (Aug., 1964), p. 517.

漢學這一概念。有人將對於近現代中國的研究也歸入漢學之內，而有學者則將其歸為中國學範疇之內。總之，關於漢學這個概念是沒有統一界定的。這一點，在《亞洲研究雜誌》的編者記中就有所提及。⁶ 因此，這次討論會的發起人施堅雅就在討論主題中規避了這個問題。但是，這並不是說就沒有學者針對這一問題進行思考和討論，相反，牟復禮從對於漢學概念的思考出發，進而討論了漢學的完整性問題。

1. 中國研究與各社會學科相結合，似乎使漢學破碎了，但學科分化基礎上必須看到整體性。

牟復禮首先說明了一個現象，即隨著社會科學引入到中國研究領域，伴隨著社會科學的分科與分化，中國研究似乎也破碎了。但是，他強調，雖然有這種破碎的現象，進行中國研究必須在承認重點和學科的分化基礎上，堅持漢學、中國研究的完整性。⁷

2. 為何要堅持漢學的完整性？

牟復禮首先是從其關於漢學是什麼的理解出發來論證這個問題的。他認為漢學「是指中國語言文學」，它的研究對象是「這個文明（指中國——筆者注）的生活中所產生的所有紀錄」。其核心角色是「語言和文學」。由此，他提出：「漢學意味著研究一個作為連貫整體的中華文明。」也就是說，漢學必須以整個中國文明作為研究對象，而不應該將其割裂開來。在說明這一點時，牟復禮也承認，漢學有其本土性和區域性。但是，他認為，正是這種本土性和區域性，才要求漢學必須走向本土，走向本土人對於中國文明的理解和意識，這樣才能真正認識中國文明。⁸ 而就人們經常提及的地方性和地方忠誠問題，牟復禮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雖

然中國具有這種特徵，但在中國文化中真正的卻是其整體性。牟復禮強調漢學的整體性，但是他也說明，這並不是要剝奪漢學家獨立思考具體問題的能力和思想。此外，牟復禮還說明，漢學的完整性是維持思想整合能力的前提。

3. 關於如何獲取完整性？

既然漢學的完整性如此重要，那麼如何能實現漢學的完整性就是一個關鍵問題。牟復禮從其關於漢學的理解等方面出發，論證了實現漢學完整性的途徑。首先就要學習中國語文學。而做到這一點，並不是就能實現漢學的完整性，還需要進一步學習母語、定居在其中，以獲得本土人的整體意識。其次，態度自覺。所謂態度自覺，就是要求研究者在主觀意識上能夠保有從整體上看待、認識、研究中國的思想意識。而這一點對於中國研究來講，在牟復禮看來是非常重要的。再次，要給予一定的期望。實現漢學的完整性當然有其難度。既要有研究主體的自覺，又要有對客體的完整把握。那麼在學術研究中，面對難度時應該是什麼態度呢？就漢學完整性來講，應該面對困難，積極實現。因此，牟復禮強調，為了實現漢學的完整性就要有期望。期望，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積極地推進。那麼牟復禮的期望是否有其根據呢？牟復禮認為，實現這種完整性是可能的。「我們能負擔得起至少在語言、文學、歷史和哲學（用我們西方的界限）訓練一些人的奢侈代價，這是最低限度的開始。我們必須期望這些人可以去獲得知識，以及具有產生了豐功偉業或者其自身就是偉大文明生命的不朽作品的思想觀點。可見，在牟復禮看來，他強調漢學要作為「學」，就必須要堅持完整性。

6 Editor's Not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4 (Aug., 1964), p. 505.

7 牟復禮在文中提及：「文化在其從中心地區擴散到邊遠地區——在那裏部分地接受到了多種文化版本而往往誇大地尊敬它——過程中的破碎，產生了各種『中國研究』與所謂的『學科』結合的形式。在一方面的破碎，另一方面表面上體現了並不真正影響較大完整性的地方忠誠之間有一深刻的差異。」Frederick W. Mote, "The Case for the Integrity of Sinolog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 4 (Aug., 1964), p. 531.

8 牟復禮強調：「漢學必須走向本土。在這樣做時，將會發現，本地人可能真正從帝國主義階段學到了一些有用的管理細節，但他們自己一直提供了這個領域完整性的真實意識，並保持其最佳真正的界限。」同註 7，頁 532。

(三) 防止學科崇拜問題

一種研究如果按照科學研究的規範來規範研究，並得到學術界的廣泛承認，這當然有利於這種研究的健康發展。但是，當一種研究系統化、規範化，或者說學科化後，也要注意保持研究的活力和動力，而避免陷入學科的教條、封閉和僵化，否則這種研究的生命力和活力必然會遭到遏制，甚至窒息其生命力。對此，美國學界於1960年代討論中國學的學科問題時，史華慈就提出要防止「學科崇拜問題」。關於為何以及如何防止學科崇拜，史華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學科崇拜會導致研究無法得到合理的結果。在史華慈看來，學科崇拜首先就表現為研究的機械化、僵化、教條化，即以學科中僵化的模式或系統來裁剪對象。而這種做法的危害將是很大的。「機械地應用一個孤立的『學科』，勉強地以一個自足的『模式』或『系統』構思一個在其他方面一直沒有得到人們有系統研究的文化（無論是當代的或傳統的），可能會導致毫無結果的，甚至是荒謬的結果。」⁹這裏，史華慈提醒人們，中國學雖然開始步入學術殿堂，開始走上學科化，並開始得到認可，但是人們不能孤立這一研究，不能機械地來看待中國學，來進行中國研究。不能將中國學中國的模式或系統教條化，不能所有的研究都以某種模式或系統來套用在中國，否則將會導致研究毫無意義。縱觀中外中國研究，可以看到，史華慈的這一提醒是有其深刻性的。首先，在美國的中國研究中，就相繼出現了史華慈所擔心的現象，這方面最為典型的就是自費正清以後，中國研究中出現的「衝擊——回應」、「傳統——近代」、「帝國主義」等研究模式，很多美國學者在研究中國時，往往都是套用這些模式，因而帶來了嚴重的問題，而上述模式本身在某些中國具體問題的研究中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很多學者學科崇拜的作用下，將其神聖化、普遍化結果導致出現了嚴重問題。¹⁰

同時，不得不承認，史華慈所提醒和擔心的問題，同樣也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學術研究中。改革開放以後，大陸學術迎來了發展的春天，同時中外學術交流也有了一個新的平臺。海外學術思想、觀點、方法等紛紛湧入中國。而在不少大陸學者中，甚至也出現了一種「西方崇拜」現象。凡是西方的觀點、理論、方法似乎都比中國的好，於是在大陸很多學科就出現了盲目援引西方學術思想、觀點、理論、方法的現象。其中，在1980年代在大陸曾引起轟動的《河殤》便是典型的案例。《河殤》無論從觀點到論證方法都是搬用西方的，而在當時引起轟動，這種現象不能不說是一種學科崇拜、西方崇拜。而當今，在中國學界，這種現象又以另一種面目呈現而不自知。縱觀今天的大陸學術，可以看到的是，在很多學科充斥的都是西方術語、觀點、方法。有些學者甚至以販賣西方學術為生、為榮。當然我們這裏並不是要提倡拒絕西方學術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要提醒學者考慮在引進西方學術的時候，也要避免西方崇拜，要理清哪些觀點、思想、方法等是符合實際研究的。同時也要考慮，引進西方學術，不能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做「鸚鵡」、「留聲機」的工作，而應該深入到學習、引進對象的本質上，並在此基礎上加以發展和深化。

其次，學科分化、封閉、割裂的問題嚴重。當一種研究走上學術軌道，成為一門學科，無疑是有助於這種研究的發展，但同時也造成了一種危險，即容易形成學科封閉。這一點也是史華慈所強調要注意的，特別是剛剛步入學術殿堂的中國學。而史華慈之所以強調中國學要預防這一點，也是基於他對於當時學術狀況的認識。史華慈指出，各學科都期望將自己視為一獨立學科，但完全的學科獨立是不可能的，像是經濟學領域中，已有很多數學模型及典範，但仍不能被視為一完全自主的學科。在現實中，不僅舊的學科分科依然存在，而且還在繼續。這種過分強調學科的分化，將會造成對其他學科

9 Benjamin Schwartz, "The Fetish of the 'Disciplin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 4 (Aug., 1964), p. 537.

10 關於上述模式的問題，可參見保羅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2）一書，以及大陸學者關於美國中國學的相關研究述評，參章磊，〈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關於美國的中國研究之譯介〉，《當代中國研究》92（2006.1）。

合理思想、觀點、方法等等的拒絕，是不利於研究發展的。

再次，對待學科的態度。既然要防止學科崇拜，那麼應該如何對待學科呢？特別是對於中國研究而言，如何對待其學科化呢？史華慈認為，對待學科的態度正確態度應該是「寬容」、「包容」、「接納」。他說：「所涉及的並不是實證調查的方法問題。任何提供了獲取資訊——文獻的、考古的、訪談的，等等——的途徑都應受到所有人的歡迎。『真正的困難，並不在於實證，而在於『不切實際』的方面——在於這樣的假設：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都應被構想為用以處理脫離於人類經驗模型。而這種模型，並不是一個思想或理論，即使它可把一般從其他地方衍生的思想和理論用作其自身的磚石。』¹¹也就是說，人們在看待學科時，不能將其視為各種模型，而應該將其作為一種思想或者理論。同時，為了避免學科崇拜就要善於吸收、接納其他學科，特別是能夠提供獲取資訊的途徑。也就是要抱有寬容的、包容的、接納的態度。在實際中，史華慈的警告和建議就為中國學與其他學科進行合作研究，這就為主張中國研究引入跨學科研究方法提供了思想和理論基礎。

二、中國研究的研究方法問題

一門研究要成為「學」，就必須要有確定的學術規範，而其核心則是這門「學」的研究方法。

史華慈認為，中國學作為學科是不能封閉的，而在1960年代的討論中，多位學者討論了中國研究與其他學科（主要是社會科學）的關係，並強調要推進雙方的合作。關於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的互動關係，有學者從社會科學在中國研究中作為角度加以探討，也有學者從中

國研究對社會科學意義加以探討。在此基礎上，學者也認定中國研究要加強與社會科學的關係，進行跨學科地中國研究。

（一）社會科學能為中國研究做些什麼？

弗里德曼專門就此進行了討論。他指出一個現象，「社會科學對中國研究能做的似乎是很少的……致力於中國主題研究的社會科學家的數量和品質都是如此之低，以至於漢學家們有了忽視他們的一個好藉口」。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漢學家，他們獨霸中國研究，將其他學科的中國研究排除在外了。「這並不是漢學家們自身是眾多的或優秀的；而是他們擁有在他們自己領域裏成為大師的優勢（並知道如何向不需要的客人們關上大門），並如同他們認為必須維護學術標準和維護一個帝國一樣愚鈍，來保持他們專業的特權。」¹²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至少到1960年代，漢學對待中國研究以及對待其他學科進行中國研究的態度是排斥的、狹隘的。而這種狀況無疑是有害於中國學發展的。雖然如此，弗里德曼對於雙方的合作還是抱著樂觀態度。他說：「『區域研究』是我適度樂觀的一個原因。」而這種對中國進行區域研究的專家的出現，也改變了中國學學者在漢學家心目中的形象。

其次，弗里德曼指出在當時社會科學領域中進行中國研究的困難，這種困難主要就是無法進行實地研究。「當我們有年輕人熱衷於這一領域時，它是荒謬的、封閉的。」「田野工作是不存在的。」而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一方面通過研究其他華人地區，如香港、臺灣、海外華人地區來解決，另一方面是通過遙距式研究來解決。但是這兩種都是無法真正滿足社會科學對中國進行研究的需要的。¹³

11 同註9，頁537-538。

12 Maurice Freedman, "What Social Science Can Do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3, No.4 (Aug.,1964), p. 523.

13 弗里德曼提及：「更加成熟的社會科學家經常想要去做田野研究。對於他們來講，臺灣、香港和海外華僑地區也是可能的區域；但是，如果他們真正隸屬於中國研究的話，他們不太可能長久地滿足於這個偉大國家的邊緣或影像地區。」「在最近十年間，關於共產主義中國的一些研究已由中國人和建立在一些直接觀察基礎上的外國人出版了，但是我並沒看到在共產主義來臨之前由研究標準來判斷時，他們是如何能夠被歸類稱為田野研究的，更別提當衡量標準與現在對世界其他地方田野研究的期望相反時了。」同註12，頁525。

再次，中國研究引入社會科學的原因。雖然社會科學進行中國研究有其困難所在，但是弗里德曼說明中國研究引入社會科學的積極作用。第一，為中國研究提供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第二，是可以以更為嚴格的學術規範進行中國研究、打破研究壟斷。第三，社會科學為中國研究提供材料，而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思想理念。第四，社會科學為中國研究提供研究模型。那麼社會科學的模型和中國研究之間應該是什麼關係呢？弗里德曼認為，模型不能解決所有中國研究的問題，也不能取代中國研究。也就是說，漢學與社會科學應該是相互補充的。從根本上，弗里德曼認為，社會科學對於中國研究的貢獻，「依賴於我們通過社會科學想要幹什麼」。

（二）中國研究可以為社會科學做什麼？

施堅雅首先從整個社會科學發展的角度論述了中國研究的意義。他強調，在當時，社會科學存在嚴重的狹隘主義，而這嚴重影響了社會科學理論的普適性。他所說的狹隘主義，主要就是社會科學理論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經驗的基礎上，而關於非西方社會的社會科學理論則非常之少。更為嚴重的是，西方社會科學家還認為建立在西方經驗基礎上的社會科學理論是普世的，是關於整个人類的理論。「社會科學家在聲稱普遍性時卻是地方性的。他們研究西方人，卻說是整个人類。」雖然，漢學是地方性的，但就這一點上來講，他不應該受到指責，因為，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更具有地方性、狹隘性。「這些學科，如漢學、經濟學以及政治學，不僅在西方世界中發展，而且如同西方的研究機構——這些學科本質上依然保持著，植根於建築在西方世界及其前沿中的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中……太多的社會科學家是某個領域的專家而不自知。太多的社會科學限制了其對西方社會調查的範圍。學科的研究人員迴避對他們自己以外社會的實證研究，而且他們往往對吸收已經完成的『外國』研究的影響毫無準備。結果，理論嚴重缺乏普適性。」那

麼要打破這種狹隘主義，推進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就必須要關注並研究非西方社會。「如果這些學科走出狹隘主義，走向人類的普世科學，那麼我們需要大規模地對西方傳統以外社會進行實證研究。」¹⁴

其次，選取中國來進行社會科學的研究可以打破狹隘主義。既然要打破狹隘主義，那麼就要選取非西方社會進行社會科學的研究。那麼選取哪裡，就是個問題。¹⁵施堅雅認為，中國就是最適合達到這個目的的個案。為何中國是最適合的呢？在施堅雅看來主要是中國情況獨特的重要性和中國特色社會的眾多特殊性。具體來說有以下原因：首先，在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社會中，中華文明的重要意義是僅次於西方文明的。「雖然西方傳統為現在新出現的世界文明提供了大部分基礎是事實，但是中國是否將在阿爾及利亞、印度、日本或奈及利亞同等意義上參與世界文化，仍有待觀察；中國還可能對形成新興國際文化基礎的西方構成一個強大的挑戰。」其次，在展示獨特的意義上，針對普遍理論發展的比較分析，中國社會是不能被遺漏的。再次，中國的社會發展也是世界歷史中一個最好的紀錄，且此歷史紀錄非常適合制度性分析。最後，當代中國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共領導的革命勝利之後，以及「冷戰」的開始，無疑加重了中國在國際上的戰略價值。同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正在發生顯著的變化。而這些，也正是從事當代中國研究的美國學者所關注的。¹⁶

（三）歷史學與中國學的關係問題

中國學的主體就是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在1960年代，美國學界關於中國學學科的探討中，芮瑪麗（Mary C. Wright）進一步說明中國歷史研究與中國學之間的關係。實際上，在中國學出現之初，中國歷史研究是沒有地位的。芮瑪麗指出：漢學家視少數自稱為中國歷史學家的人，是因為沒有能力掌握晦澀的文本，才從事歷史研究。而漢學家則被中國歷史學家認為是用了一個虛假

14 同註5，頁518。

15 施堅雅認為：「由於社會科學家不能深入研究所有社會，但必須選擇一定的社會，他們可能會包括那些對人類歷史和未來具有重大影響意義的個案。」同註5，頁518。

16 同註5，頁518-522。

的理由，將歷史研究的標準排除在研究之外。¹⁷

芮瑪麗首先從歷史學到特徵分析入手，進而強調了中國歷史研究正在得到更多社會科學研究者重視的現實。她認為，歷史學的主要特徵在於其時間意識，「在我看來，歷史學的顯著特徵是其時間意識，如同東方主義永恆的顯著形式，以及在很多社會科學領域中其他種類的永恆形式。史學家通常研究過去不是因為它是過去的，而是因為時間的序列對我們的取向是根本的」。而社會科學研究也在不斷涉足中國歷史研究領域。「史學家正在做的任何事都超越了玷污我們一般的帶有浮誇目標的思想，因為反映中國歷史連續體各個方面的資源，有擁有或正在設法獲得精確界定問題和嚴格分析方法的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的專家。」¹⁸ 然後，芮瑪麗主要強調了中國歷史研究的必然性、重要性。

1. 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中，與中國研究分支結合的現實及其必然性

芮瑪麗強調，歷史研究必須和社會科學相結合，首先，中國研究可以在理論上擴展到歷史研究領域。其次，歷史研究者歡迎與其他領域的中國研究合作。¹⁹ 但是，在實際中這種合作又受到多個因素的限制，而這些因素，也正是強調中國研究各分支要採取歷史取向的重要原因。這些因素主要有：第一，多數社會科學家認為學習中文，進行中國研究不值得。因此，就要克服這種偏見。「一個短期項目而學習中文是不值得的，並且很少有社會科學家會覺得對於一個單一的文化地區進行長期的知識承諾是合理的，即使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有趣的。」第二，很多事件不是僅用邏輯分析就可以的，而是要通過歷史分析。「甚至在對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都有吸引力的偉大問題上，也有歷史的文本，對此無知將導致最荒謬的方法。它是社會科學的拓荒者，他說很多的時間被浪費

在設法通過邏輯解釋事件，而這些事件只能通過歷史來解釋。」第三，社會科學為中國研究提供理念、思想，而中國歷史研究為社會科學提供經驗，也就是說二者工作是相互依賴的。「如果沒有有組織的發源於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理念，那麼歷史就是更加貧困的。所以相反地，這些學科的專家都依賴於歷史學家以打開一般範圍的中國經驗，在他們能在其領域內界定重要的問題之前，中國經驗被記錄下來。我並不是說，歷史學家告訴社會科學家看哪裡，至多是社會科學家告訴歷史學家我們的工作真正意味著什麼。」「在實際的術語和基本知識的術語上，在處理一個我們所有人都關注的問題中，我們相互依賴於彼此的工作：中國特別的文明是如何出現的，它通過什麼階段，是如何導致今日之中國的呢？」²⁰

2. 中國歷史對於思想發展的重要性

首先它可以檢驗社會科學的思想。社會科學的理念、思想是否正確，從根本上來講，還是要回到實踐中來加以檢驗。芮瑪麗認為，這也正是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之一。其次，中國歷史在歷史思想的發展中能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芮瑪麗強調了四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國經驗的獨特性。「在說明很多對今日西方歷史學家有巨大吸引力的問題中，中國的歷史經驗是獨一無二豐富的。這些問題例如有：官僚組織、統治的合法化，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國際組織系統、社會的流動性、城市發展、經濟發展與其他社會變遷的關係、藝術上有利於活力的條件、科學思想的前提，以及其他數十個問題。」第二，中國文化達到的成就符合歷史研究的苛刻標準。「其次，史學家最好用高文化成就的人的歷史來進行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的益處和價值需要與被研究的群體所達到的水準沒有聯繫。在這裏，歷史離人文學科較近；品質上和中國達到的水準符合最苛刻的標準。」第三，中國歷

17 Mary C. Wright,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Voca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 4 (Aug., 1964), p. 513.

18 同註 17，頁 513-514。

19 芮瑪麗表示：「社會學家如果處理更多這樣的問題，那麼熟知我們不得不在許多社會學家或『純』人文學家將會很好地界定問題的、發明探尋方法的、評估證據的領域來進行開拓的史學家將歡迎他們的幫助。我不擔心競爭，因為我們需要社會科學家比他們在可預見的將來可能給我們的更多幫助。」同註 22，頁 514。

20 同註 17，頁 514-515。

史的綜合性，為史學家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樣本。「史學家設法看到他們正在檢驗的所有特殊的經驗範圍互相聯繫的方面；即使當他們不是就『一般的』歷史時期問題來書寫，而是就它的一個方面來書寫時，他們想要看到的是在它整個背景下的那個方面。在很多領域，他們面臨著儘管歷史資料是某個國家的，但歷史的力量超越了國家界線的困難。在中國歷史中，直到最近，資料和力量都是一致的；他們都是一個從已知世界的中心到邊緣都沒有一個嚴格的邊界的，單一的、連貫的、超國家的、文化的、社會的，以及政治實體的結果。」第四，中國歷史的時代性。「雖然我對被稱做『同時代的詛咒』——學識的重要性直接依賴於其可論證的與一個在當前國家和國際事物中主要問題的相關性——深感遺憾，但確定的是：歷史學家確保這些問題的歷史維度的事務是已知的」。「20世紀後期世界的一些重大問題將包含中國。最後，熟悉中國歷史能給予我們職業以一些賦予前輩最好工作以特色的熱情、樂趣和冒險，但當研究生在已經耕耘很好的領域內尋求可能的『原始的』補劑時，這些又很容易會失去。」因此，芮瑪麗得出結論並強調：「我認為，中國歷史的研究對於其他中國研究的分支是舉足輕重的，並且對於今日歷史思想的一般發展也同樣是舉足輕重的。」²¹

縱觀美國學界關於中國研究與其他學科關係的討論，可以看出，他們基本上都認識到，中國研究必須在堅持其整體性基礎上，積極吸納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而中國研究跨學科方法的運用則會進一步深化各門社會科學的方法、理念、思想等。

三、結 論

1960年代的討論是中國學發展日趨成熟的體現。很難想像，一種研究在沒有成熟的時候就開始討論其學科問題的。這是不符合學術發展規律的。而美國中國學，經過了費正清以來眾多學者的推進，在諸多方面都得以廣泛開展。而中國研究在美國的復甦，則直接的推動了

學科問題討論的開展。同時中國學的復甦可以說為學科問題的討論奠定了直接的學術基礎。因為沒有充分的研究，根本談不上學科問題的討論。

學者們集中討論了中國學的核心方法論——跨學科、跨文化研究，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學走向成熟。由前文可知，關於中國學的討論，核心是學科問題，而關於學科問題的討論中，學者集中討論了中國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問題、與歷史研究的關係問題，實際上，這些問題的核心就是如何實現中國學與社會科學方法的結合。也就是在中國研究中如何實現「跨學科」研究，關於中國研究實現跨學科研究，可以說是這次討論會上學者們的共識。跨學科研究其實不是新問題，早在費正清創立中國研究之初，他就在宣導跨學科研究。但是1960年代的討論則將其提到學科的高度來討論，就具有了重要意義。這就意味著，跨學科研究是中國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其核心的方法論特徵。而在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學者所說的跨學科一方面是指中國研究要從社會科學中吸收、借鑒方法，還要積極吸收、借鑒他們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指，中國研究可以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經驗、思想、檢驗的場所等。關於多學科合作的討論，即跨學科方法論的肯定，為日後中國研究奠定了根本的方法論。

跨文化研究從邏輯上講是美國中國研究的必然結論。在1960年代的討論中，學者們雖然沒有直接以此為題展開討論，但是在學者們關於中國研究的比較研究中，則鮮明地體現了跨文化研究的特徵。而這一點也基本上是學者們的共識。芮瑪麗明確提出了「所有的歷史都暗含了比較」的觀點，而弗里德曼和施堅雅則在討論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時，充分闡述了將中國與其他社會進行比較的重要性。「比較是什麼呢？所有關於社會的思考都是比較，並且由西方漢學家提供的關於中國歷史枯燥而狹隘的解釋，不可能避免選擇用於說明他們的主題、語言，以及提供解釋的作家所來自的世界的印記。一項中國社會的非可比研究是不可能的，除非它由從未聽說過其他社會的中國學者來撰寫。」「就比較的目的而言，哪個社會與中國相關呢？答案是所有的社

21 同註17，頁516。

會。」既然要將中國與其他社會進行比較研究，那麼必然也就要做到跨文化研究。因此，羅茲·墨菲（Murphey Rhoads）在討論會評論道：「這種要求苛刻的研究領域應該是有益於自我的，而且人們希望它應該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益於確保對其學科技巧、跨學科能力、全球的跨文化承諾和漢學總體性的專注的回應。」²² 通觀 1960 年代以後的中國研究，基本上都是延續著這一思路。

再次，是對美國中國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總結。關於如何進行中國研究，實際上早在 1930 年代就有學者進行過思考和闡述。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普萊斯（Maurice T. Price）於 1932 年發表在 *Pacific Affairs*（《太平洋事務》）上的一篇討論文章——〈漢學和社會研究：漢學家和學術專家間的合作研究〉。普萊斯在文中就以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作為案例，強調了漢學要與社會科學結合。而 1960 年代的討論無疑承續了 1930 年代的討論，並且加以系統化、理論化了。

此外，1960 年代的討論中突破了西方的中心論。由前文可知，美國學者在強調中國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必要性時，又一個重要的論據就是當時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為中心的，而這與其所標榜的普遍性是不符合的。而通過中國學則可以修正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狹隘主義。這一點在保羅·柯文提出的中國中心觀那裏得到了進一步的闡述和強調。

綜上所述，中國學在 1960 年代得到了美國學界的高度重視。而這種重視的體現就是開始廣泛討論其學科問題。其中關於中國研究的學科探討，有學者認為中國研究較漢學更具有「學」的特徵，當然也有學者立足於漢學強調其人文學科的特點，以及漢學作為學科，要堅持其完整性。此外，1960 年代的討論涉及到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的互動關係，在此基礎上，學者們趨於認定了中國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問題。這次探討的出現，在美國中國研究史上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22 Rhoads Murphey, "Discussant Remark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 4 (Aug., 1964), pp. 535-536.

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申請須知

- ※ 本中心獎助國外大學和學術機構之外籍漢學研究學者來臺研究
 - ※ 提供經濟艙直飛來回機票乙張及每月研究補助費

教授級	NT\$ 60,000	副教授級	NT\$ 50,000
助教授級	NT\$ 40,000	博士候選人	NT\$ 30,000
 - ※ 提供在臺獎助期間意外傷害保險新台幣一百萬元（附加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 ※ 研究期限：三個月至一年
 - ※ 申請文件：1. 申請表 2. 簡歷表（含著作目錄） 3. 研究計畫 4. 推薦函至少一封
 - ※ 截止日期：2009 年 5 月 31 日（執行日期為 2010 年 1 月至 12 月）
 - ※ 如欲了解詳情，請與漢學研究中心聯絡或上網查詢
-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電話：886-2-23147321 Fax: 886-2-23712126
E-mail: ccsgrant@ncl.edu.tw http://ccs.ncl.edu.tw